

謝林 徐大平 楊居讓 主編

陝西省圖書館藏 稀見方志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陝西
省
自
治
區
圖
書
館
藏

謝林 徐太平 楊居讓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稀
見
方
志
叢
刊



1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陝西省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陝西省圖書館編.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6. 9

ISBN 7-5013-3158-8

I. 陝… II. 陝… III. 中國-地方志-叢刊 IV. I29-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77714 號

責任編輯:殷夢霞

書名 陝西省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全十六冊)

著者 陝西省圖書館 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大興古籍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700

版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3158-8/K·1397

定價 7200 圓

《陝西省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責任者名單

主 編：謝 林

副主編：徐大平 楊居讓

編 委：侯藹奇 郎 菁 朱亞莉 劉 穎 劉安琴 陳 新

前言

編修地方志是我們中華民族特有的優良文化傳統，這一優良傳統，至今已有了兩千年歷史。而在其產生和發展過程中，曾經歷了地記、圖經和成型方志三大階段。特別是自隋唐直到清朝乃至民國，每個朝代的中央政府總是三番五次地下令各個地方政府，必須按時編修，限時上呈。所有這些，史書都有明確記載，有案可查，有些命令，甚至對具體編寫內容都有明確規定。因此，我們說我國的方志編修，任何時候都是政府行爲，由中央政府下令，各個地方政府執行編修。因而無論任何時期、任何地方都是普遍的、連續不斷的，這種情況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可能有的。尤其是到了宋代，方志成型以後，歷朝竟還流傳下來八千多種各類志書，這是我國一個偉大的、特有的文化寶庫，這中間蘊藏着許多史書不曾記載的重要史料，可以補史書記載之不足。可見這座文化寶庫是非常豐富的，非常重要的，不同學科、不同行業的人，從中都可以或多或少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各種資料。所以，我們應當很好地重視它，珍視它，更要很好地開發和利用它，使它能够在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中起到應有的作用。

非常可喜的是近年來已有多家出版社先後出版過各類方志叢書，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去年開始陸續推出的由全國數十家著名圖書館收藏的《稀見方志叢刊》，則是其中別具特色的一種。

我們說這套方志叢刊其最顯著的獨特之處，就在於都是『稀見方志』，這就是說，這些稀見方志以前很少在社會上流傳過，其中有許多都還是鈔本和稿本，還有許多則是該地建置後首次所修之志書，長期以來一直分散收藏在全國各地的圖書館之中，當然也就很少有人能有機會看到，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這麼多的稀有方志，大都還是『藏在深閨人未識』。就以已經出版的《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而言，這些方志之中，有些原是清末藏書家方功惠碧琳館舊藏，後歸清郵傳大臣盛宣懷愚齋收藏，有的還蓋有『方功惠藏書印』、『讀耕齋之家藏』、『愚齋圖書館藏』等藏書印章，當然這些志書彌足珍貴。又如收藏在陝西省圖書館的明代天順年間刊刻的《襄陽郡志》，萬曆年間著名藏書家黃居中、黃虞稷父子的藏書目《千頃堂書目》中竟然沒有著錄此書，而千頃堂乃是一家享有盛譽的大藏書樓，當時藏書已有六萬餘卷，却尚未收藏到這部志書。到了近代，著名方志學家朱士嘉所作的《中國地方志綜錄》也未著錄此書，可見傳本之少，洵可珍貴。書中鈐蓋有清乾隆年間太倉藏書家陸時化的藏書印，據吳晗先生的《江蘇藏書家史略》載：此人『嗜法書名畫，精鑒別，聚書萬卷，購善本而手校讎之。』又書中還有丹徒趙氏積微室藏書印等。後來又不知於何時流傳到北方，並為陝西省圖書館所收藏，這就不得而知了。對於這部志書，《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著錄時稱刊刻時間為明天順三年（一四五九），但閱讀其內容則可發現在學校、廨舍、壇場、橋樑、津渡、科舉、歲貢等目的文中，却多次出現天順四年的內容條文，可見此志的刊刻不會早於天順四年，或許稍遲一些，關於這一點，該書《提要》作者亦已指出。再如收藏在內蒙古圖書館的《綏遠通志稿》就更加特殊了，作為綏遠省，今天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了，因為它僅僅存

在二十六年，一九一四年曾置綏遠特別區，一九二八年（有的作一九二九年）改置省，省會在歸綏（今呼和浩特市），一九五四年撤銷，並入內蒙古自治區，因此存在時間很短，盡管如此，仍爲我們留下一部一百卷的省志稿，這也再次說明我們特有的這一文化傳統的普遍性，這種現象無論那一個國家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據文獻記載，綏遠改置省後，首任省主席李培基馬上創立了綏遠通志館，先後聘任了館長、副館長和總纂，當時榮祥亦參與纂修。到了一九三六年，《綏遠通志》的初稿已接近完成，時任省主席的傅作義從北京請來著名學者傅增湘任總纂。傅接任後，又請來了學界名流吳廷燮、瞿宣穎、謝國楨等人參與修纂，七七事變發生後，纂修工作陷於停頓。一九三八年應偽蒙疆政府的要求，傅增湘繼續了通志的編修，並請來吳豐培、孫楷弟等多位學者相助編修，至次年定稿完成，交偽蒙疆政府內務部。一九四三年，通志稿竟由日本東亞文化研究所帶到東京影印出版，兩年後適逢美軍轟炸東京，影印成品與定稿遂都付之一炬。一九六〇年和一九七〇年，榮祥等人對綏遠通志館的原稿，先後兩次進行了修訂，最後定稿一百卷，三百餘萬字。這部志稿現收藏在內蒙古圖書館，當然社會上不可能有過流傳，今若將其正式出版，自然又是學術界一大福音。這裏特別要指出的是，這部志書的編修真是歷盡艱險，而十多位學者先後參與其事，真正稱得上是專家修志。尤其是吳廷燮、瞿宣穎兩位，更是著名的方志學家，前者先後編纂過《奉天郡邑志》、《奉天通志》、《北京市志稿》等，後者則於一九三〇年已經出版了《方志考稿》（甲集），這是我國第一部方志著作提要，全書著錄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山西、江蘇八省方志六百餘種。既是提要，實際就是對六百多種方志進行評論。此書之作，乃是瞿宣穎以天津任振採

天春園所藏志書爲取材，時任氏已聚方志一千五百種，而瞿宣穎本擬將這些志書全部寫出提要，以成『乙集』、『丙集』之計劃，後因故未果，但他個人閱讀方志之多却於此可見。

這套《稀見方志叢刊》第二大特點就是『鄉土志』特別多。鄉土志其實也是方志的一種，只不過在編修過程中，不够規範化而已，不過，實際情況也並非全是如此，有的鄉土志篇目設置相當規範，只是名稱不叫縣志、州志，還是稱鄉土志。這裏不妨舉例說明，如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鈔本《白水縣鄉土志》，在其篇目中，就沒有歷史沿革、職官、人物等內容，而只記白水的氣候、習尚、冠婚喪祭、歲時、物產、陶器、礦產、藥材、木屬、草屬、果屬、疏屬、毛之屬、花之屬、羽之屬、蟲之屬、介之屬、方言等內容，這顯然就是一部典型的『鄉土志』。又如清末稿本《涇陽鄉土志》，現存卷三，主要記載各類人物，門目有耆舊、孝友、忠義、義行、節烈，其他內容均不載，這實際上還是漢魏時期流行的耆舊傳形式，當然，這只是鄉土志中非常特殊的一種，實際上不應屬於鄉土志，因爲鄉土志一般都要記載該地的山水、物產、風俗等內容。我們還是舉例說明，如修於清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的《朝邑鄉土志》（陝西省圖書館所藏爲宣統年間鈔本），全志約三萬字，分歷史、地理、山水、政績、兵事、氏族、道路、宗教、物產、耆舊、戶口、實業、商務等門目，在歷史門目中還列有沿革表。就其內容來看，已經相當齊全，其實已經稱得上相當規範的縣志了。如果將其與明代韓邦靖的《朝邑縣志》和康海的《武功縣志》相比，真正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朝邑縣志》全書僅五千六百字，分總志、風俗、物產、田賦、名宦、人物、雜誌七類。而《武功縣志》，全書也僅兩萬字，分爲地理、建置、祠祀、田賦、官師、人物、選舉七目。對這兩部志書，清代許多人將其吹捧很高，梁啟超對這

些吹捧者曾作過嚴厲的批評，指出『耳食之徒，相率奉爲修志楷模』。大家可以想像，五千六百字如今只是一篇中等篇幅的論文而已，若是寫一部內容豐富的縣志可能嗎？對此，筆者在拙著《方志學通論》中已分別作過評論，這裏不再重複，目的僅是用這兩部志書來說明，許多內容豐富的鄉土志，其文獻價值，絕對都在這類縣志之上，而不僅是這兩部縣志。我們不妨再列舉收藏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的民國初年編修的《崖州直隸鄉土志》爲例，該志僅兩卷，上卷爲歷史，分沿革、政績、兵事、耆舊、名宦祠、鄉賢祠、忠孝祠、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下卷爲地理，分區域、古迹、祠廟、橋樑、市鎮、學堂、山、水、海岸、道路、物產、製造、商務等共二十五目。其內容可與光緒二十六年所修之《崖州志》相互參考，並可補其不足。即如『商務』一目，記崖州每年生產、營銷進出口物資種類與數量，是研究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海南貿易經濟的重要資料。因此，我們切不可忽視鄉土志這一重要的地方文獻。在這套《稀見方志叢刊》中，鄉土志所占的比重是相當大的。就以《陝西省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而言，所收關於陝西的著作共五十二種，其中鄉土志就有二十二種，可見數量之大。又如南開大學圖書館所收藏的稀有方志中，就有《沐陽鄉土志》和《滁州鄉土志》兩種，都是稀見的孤本。現在都將其出版，必將有益於廣大學人和各地方志編修工作者。

這套《稀見方志叢刊》第三大特點就是稿本多，鈔本多，還有的雖是刻本，但留存的已經不多，並且還是該地首次所修的志書，當然也就顯得珍貴。上文已經談到，內蒙古圖書館所藏之《綏遠通志》，就是一部非常珍貴的稿本。而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清宣統三年（一九一）所修的

《昭覺縣志稿》四卷，亦很珍貴。昭覺今屬涼山彝族自治州。宣統二年，四川總督趙爾巽奏請設縣，是爲此縣置縣之始，宣統三年志稿完成，可見建縣與修志實際上是同步進行。加之志稿編纂者徐懷璋又曾任昭覺設治委員，奉命經辦昭覺縣籌建工作，因此志稿中保存了許多珍貴的原始資料，諸如當時的公文奏牘、法令法規等。舉凡城市規劃、經費籌措、道路管理，乃至物料工價，無不具載。尤其是志稿中所記載的涼山彝族情況，如家族、戶口、風俗、文字等，都有重要反映。在第三卷記述風俗時，還將彝族經典傳世之作《勒武特衣》（亦作《勒俄特衣》）收入，並譯爲漢語，凡此種種，都足以說明這部志稿確實非常重要。該館還收藏有完稿於一九五三年的《南潯鎮志稿》四卷。南開大學圖書館亦收藏有《新城縣志》、《蒲城縣志》兩部志稿。陝西省圖書館則收藏有三部志書稿本。至於鈔本，那就更多了，陝西省圖書館所藏稀見方志共五十五部，其中鈔本竟有三十部。而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稀見方志二十部，其中鈔本則有八部，這些比例都是相當大的。值得注意的是，有的鈔本其價值甚至與稿本相當，如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的修於宣統二年的《朝城縣志略》並無刻本，只有三部鈔本傳世。又如萬曆《開原圖說》，修成後無刊本，僅有鈔本四部傳世。類似這樣的鈔本，其價值自然就很珍貴了，而這樣的鈔本在許多圖書館所藏之稀見方志中大都存在，只不過多少不等而已，我們就不再一一列舉了。還要指出的是，在這衆多的稀見方志中，有許多都是該地區現存最早的志書，如康熙《中部縣志》四卷，是在明志失傳後中部縣的第一部縣志，該志對萬曆三年（一五七五）以後的資料作了詳細補充。又如順治《邠州志》四卷，是在嘉靖、萬曆兩種明代志書均已失傳之際，知州蘇東柱於順治六年（一六四九）續修重梓。

再如康熙《山陽縣初志》三卷，乃是明成化十二年（一四七六）山陽建縣後首次修志，故名「初志」。這些志書對於這些地方來說，都有重要意義。

這套《稀見方志叢刊》更重要的一大特點，還是在於這些方志所保存的豐富資料方面，因為在這眾多的方志之中，有些內容是相當豐富的，所記內容稱得上是五花八門，對於研究這些地方的歷史、民情和經濟發展都有相當價值。就以光緒《黑龍江述略》六卷而言，編纂者徐宗亮，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被黑龍江將軍恭鏜聘為幕僚，在此期間，在搜集大量官府檔案和實地調查的基礎上，修成此志，記事止於光緒十五年。全志約五萬五千字，分為疆域、建置、職官、貢賦、兵防、叢談六門。眾所周知，咸豐十年（一八六〇），沙俄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條約》，將烏蘇裏江以東包括庫頁島在內的約四十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強行劃歸俄國。該志書在《疆域》門中對黑龍江的疆域沿革作了較為精確翔實的考證，記述了大片中國領土被沙俄鯨吞的過程。在《建置》門，對黑龍江（瑗瑗）、卜魁（齊齊哈爾）、墨爾根（嫩江）、興安等七城的建置經過及臺站、卡倫、電報局設置過程都作了詳盡的記述。《兵防》門則記述了該省陸師、水師設置的經過及練軍的興起。此外，《職官》、《貢賦》等門也都有較詳細的記述。該志的顯著特點，是強調實邊禦侮的思想，自非一般庸人所修志書可以比擬，因為它有真實的充實內容。又如萬曆《開原圖說》二卷，亦是記載東北地區情況的一部地情書，它是一部帶有軍事地理性質的地方文獻。鑒於明代中葉起邊患連年，出於邊防的需要，因此對於邊防上的重鎮、關口、衛所，以及沿海要地亦多修有圖志。這就進一步說明，地方志的編修和發展，完全在適應當時政治、軍事和經濟發展的需要，當時就先

後產生了《九邊圖志》、《四鎮三關志》、《西關志》、《海寧衛志》等，而萬曆《開原圖說》，亦是這種性質的地情書。開原乃古代肅慎之地，明代在此設三萬衛，為東北軍事重地，明萬曆以後，中央政府與東北少數民族關係緊張，開原地位益顯重要，其『東北制諸夷，西北制諸虜』，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馮瑗編纂了《開原圖說》二卷，上卷詳載開原所屬各戍堡地理位置、軍事部署、兵力配備，並附作者按語。下卷敘述建州女真各部世系與有關情況，以及作戰營圖、對敵形勢等。在萬曆以後，東北地區對峙形勢日益惡化的情況下，《開原圖說》顯然成為一部極為重要的軍事地理著作，亦可說是當時軍情的總匯。這樣一部在軍事上如此重要的著作，出於軍事上的機密，當時沒有刊本，完全在情理之中，當然後世也就極為少見。再如康熙《江都縣志》和乾隆《通州志》兩部志書，則是研究這兩個地區在漕運和鹽務方面所起重大作用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通州素為漕運重地，東南七省，歲入數百萬糧以實京師，四方商賈雲集；揚州是長江中下游地區經濟繁榮的重鎮，『鹽漕之絡繹，商賈之輻輳』，就是這裏突出的特點；江都則是揚州之附郭，自然也就處處體現出揚州之特點，整個商業的繁榮，直接滲透到市民社會生活之中，尤其是漕運、鹽務兩大內容自然就成為這兩部志書的特色。還有《當陽縣志》也很特殊，其《典禮》一門記載特詳，對文廟祭祀的禮器、儀注以及祭祀時所用之樂譜、舞譜都有詳細記載，這是其他方志中所不多見的。不僅如此，由於當陽是關羽陵所在地，而關羽在清代被尊奉為『武聖』，故該志《典禮》門在文廟之後又有武廟。至於邊疆地區許多稀見方志，大多保存有比較豐富的少數民族資料，如乾隆《廣西府志》還專設《土司》一目。而有些縣本身就是少數民族的聚居地，其縣志內容多記少數民族之事，也就在情理

之中了。如上文已經談到的宣統《昭覺縣志稿》便是如此。又如民國六年（一九一七）所修之《同正縣志》，亦是如此。同正今爲廣西扶綏，舊名永康州，原由土司管轄治理，明代中葉改土歸流，自然都爲少數民族居住地。再如乾隆《乾州志》四卷，其第四卷『紅苗風俗』，輯錄地方文獻，記載當地土家族民情風俗相當詳細。還要指出的是，陝西省許多稀見方志中，還較多的記載了西方傳教士在該地傳佈天主教、耶穌教，廣收信徒的史實，僅在南鄭一處，就有天主教徒兩千兩百七十餘人。可見這些志書所記內容是相當廣泛的，並且所記內容亦隨着時代的發展和變化而在不斷變更和增加，充分體現出方志的時代性特色，這在每部志書的篇目設置中就可以一目了然，限於篇幅，這裏不再舉例說明。

最後還要說明一點，這些稀見的地方志書，除了保存許多重要史料和地方文獻外，有些志書對於研究方志體例的發展變化亦有參考價值。明代以來，方志編修在體例上形成兩大系列，一個是細目並列，即將所記之事一一都列目。另一種則是分綱列目，而在分綱列目中又有多種分法。如有的以天、地、人爲總綱，然後再列細目，明代學者王世貞將其稱爲『三才體』（啓蒙讀本《三字經》上有『三才者，天地人』之語）。清代趙弘化的康熙《密雲縣志》就是如此，分天文、地理、人事。亦有按土地、人民、政事三門編設總綱的，最典型的莫過於唐樞的萬曆《湖州府志》，有人將其稱爲『三寶體』，因爲它是源自《孟子·盡心篇》文中『諸侯有三寶：土地、人民、政事』的說法。清代所修的《續修臺灣縣志》就是採用了這種體裁。我們在查閱這些稀見方志時就發現，編修於光緒年間的《略陽鄉土志》，則按歷史、地理、格致分爲三卷，下面再分十門四十三目，所記內容包括政

績、兵事、宗教、實業、方域、物產、商務等內容。這種分類法就相當於明清時期產生的「三才體」或「三寶體」。但是它的分法，却充分反映出志書產生的時代特色。衆所周知，清代中後期以來，自然科學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發展，三大類中「格致」的出現，就是自然學科發展的結果，而「實業」、「商務」等門目的出現，同樣是在反映新時代的曙光。而且，看來這種分類法，還不是個別現象，如編修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的《留壩鄉土志》，全書亦是由歷史、地理、格致三部分組成，就是明證。又如編輯於乾隆初年（一七三六）、刊刻於乾隆四年的《襄陽文獻錄》，則是一部典型的地方文獻匯編，該書在分類匯輯文獻時，分爲「人」、「文」、「景」三編，這種分法也很特殊，其分類編輯的方法，同樣值得地方文獻工作者借鑒。其「人編」四卷，收錄本地自古至清順治、康熙年間人物傳記資料，舉凡傳記、像讚、事狀、墓表、祠祀等文字記載統統收入；「文編」一卷，收錄自元代楊士弘始襄城人之詩文著作，大部分還附有作者小傳；「景編」四卷，則收錄襄城山川、河流、城垣、建築、墓冢、古迹等處的文獻資料。第十卷爲「死事」，十一卷爲「宦蹟」，十二卷爲「寓迹」。如此編輯一個地方的文獻，還是不多見的，其中保存了許多罕見的珍貴文獻。所以我們說，以上種種分類方法，無疑都豐富了方志編修體例的多樣性，對於研究方志編修體例發展歷史同樣具有參考價值。

以上我們從幾個方面簡單介紹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已經出版和正待陸續出版的一些稀見方志的情況，旨在說明在這些稀見方志中確實蘊藏着不少很有價值的文獻資料，對於研究這些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等都有着無可替代的作用，有些資料還可補史書之不足。可是，長期以來，

這些稀有方志分散收藏在全國各地圖書館中，確確實實是『藏在深閨』，許多真正需要使用的人，却無緣相識。如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將其分別集結出版，為學術界做了一件大好事，為大家利用這些方志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當然，對於這些稀有方志來說，今後也就可以發揮出各自應有的作用了。不過，由於條件的制約——文章篇幅所限，同時也未能盡閱所有稀見方志——我的介紹，還只是膚淺的，也就是說可能還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可以肯定，這些稀見方志中所蘊藏的許多有價值的資料，還有待於更多的研究者與使用者進一步去發掘利用。

倉修良

二〇〇六年八月序於浙江大學獨樂齋

序言

陝西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文化積澱極為厚重。在這塊廣袤的土地上，自古以來人文薈萃，十三個王朝建都於斯，特別是秦朝一統，西漢獨尊，大唐盛世，在中國歷史文化長河中，翹楚奪目，不讓他人。這些輝煌與鼎盛，不僅使三秦大地、八百里秦川聲名顯赫，也滋養了一代代風流人物，孕育了諸多文苑英華。這塊得天獨厚的文武勝地，凸顯着陝西歷史的深厚與燦爛。因此，研究中國歷史，不可不知陝西；而研究陝西歷史，探其文化淵源和人文背景，則不可不讀陝西地方志，特別是稀見陝西地方志。這些方志更直接、更翔實、更獨特地反映了陝西各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風俗習慣的方方面面，是研究陝西人文歷史必不可少的珍貴資料。適值西部大開發之際，陝西地方志對於人們瞭解陝西、認識陝西、開發陝西，其意義尤顯重要。有鑒於此，當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的編輯同志與我們商議聯合出版《陝西省圖書館藏稀見地方志叢刊》事宜時，我感到非常高興，並作此序，藉以表達欣喜與贊同。

這次結集出版的《陝西省圖書館藏稀見地方志叢刊》，不但內容豐富而且資料珍貴。從所輯方志的地域性來說，本「叢刊」所收方志幾乎涵蓋了整個陝西。其中包括關中二十三種、陝南十八

種、陝北十一種，再加上外省地方志三種，共五十五種。

「丛刊」的另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稀見。這裏所說的稀見，是指所收錄的方志根據《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核查比對，在全國只有三家以下收藏單位。這其中有三十餘種是陝西省圖書館獨家收藏，如刻本「康熙」《中部縣志》，以及「順治」《安塞縣志》、「道光」《鳳縣志》、「光緒」《磚坪廳志》、《盤屋縣鄉土志》、《涇陽鄉土志》、《府谷縣鄉土志》等抄、稿本。這些縣志及鄉土志，不僅為我館獨家收藏，且大部分從未公開影印出版過，可以說是原版的首次亮相。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方志中，很多都是該地區現存最早的縣志，如康熙《中部縣志》四卷，是明志失傳後中部縣的第一部縣志。該志對明萬曆三年（一五七五）以後的資料作了詳細補充。正如李暄在序中云：「乃參以二十一史，準以《雍大記》，征以雍書，咨以父老先民，其間載事既該褒貶亦正，既以續舊志」。又如「順治」《邠州志》四卷，是在嘉靖、萬曆兩種明代刻本均已失傳之際，知州蘇東柱於順治六年（一六四九）續修重梓。卷目詳細，記事簡明，并增圖二十五幅，圖文並茂。可以說，這些珍稀地方志，對地方史料的補缺和傳承彌足珍貴。在所收的三種外省方志中，明代天順年間刊刻的《襄陽郡志》最為有名。無論是黃氏《千頃堂書目》，還是朱士嘉的《中國地方志綜錄》均未著錄此書，傳本之少，洵可珍矣。近代學者羅振常在此書題識中云：「張恒所纂襄陽郡志書祇四卷，而綱要不遺，殆武功、朝邑之亞，視後之繁蕪無當者相距殊遠。」書中鈐蓋有乾隆年間藏書家太倉陸時化藏書印及丹徒趙氏積微室藏書印數枚，堪稱孤本、珍品。另一種外省志《黑龍江述略》六